

天津文史資料選輯

第五十八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要目：

-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复校的前前后后
- 无硝烟的决战(上)
- 蒋纬国致大陆友人的一封信
- 黄埔系骨干——贺衷寒
- 天津旧拍卖行内幕
- 天津城隍庙话旧

天津人民出版社

天津文史資料選輯

第五十八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

文史資料委员会編

天津人民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九月

(津)新登字 001 号

执行编辑:方兆麟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
第五十八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5.875印张 130千字

1993年9月第1版 1993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7—201—01693—8/K·218

定 价:3.40元

目 录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 58 辑

致读者	(12)
-----------	------

往事追忆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复校的前前后后	朱 真 (1)
我的童年	周汝昌 (16)
集邮生活五十年	林 崧 (76)
无硝烟的决战(上)	李俊才 (134)

蒋纬国致大陆友人的一封信	(13)
--------------------	------

人物纵横

搏击血火的诗人——阿垅	郑 平 (51)
刘云若挥泪写章回	李默生 (61)
终生献身南开的伧乃如先生	张镜潭 (82)
天津近代小学教育家——邓庆澜	汪桂年 (92)
黄埔系骨干——贺衷寒	吴相和 (116)
白崇禧与共产党的一段秘密接触	沈 涛 (128)
于凤至陪监	衡 文 (86)

商海话旧

- 天津旧拍卖行内幕 田文通(33)
 股市忆旧 张澜生(46)
 解放前后天津西马路棉布市场变迁
 马紫明(65)
 春华茂银号被抢案 于昭熙(74)

艺坛杂忆

- 忆中原游艺场 王子民(40)
 天津河北梆子在边疆 甄光俊(99)
 天津第一家围棋俱乐部
 ——五五围棋社忆旧 吴同宾(108)
 天津旧舞场琐闻 王曰强(110)

城隅漫语

- 天津城隍庙话旧 王啸伯 杨春霖(87)
 三义庄清真寺的由来 白长盈 米秀津(114)
 闲话美国营盘 王有才 米秀津(130)

朱 真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复 校 的 前 前 后 后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文革”前的招收对象是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中的高中级人士，因学员的规格与当时的中共高级党校相似，而被人们称为“民主党派（或党外）的高级党校”。从1956年10月开学到1965年7月，共举办了六期学习班，有1800余人参加学习。1965年秋，因中央社院教职工要去农村参加社教运动，学院遂暂停招生。“文革”期间，统一战线被摧残得七零八落、奄奄一息，中央社院不仅停办，而且后来被撤销。由于当时我国发展国防尖端科技的需要，学院的校舍于1967年夏拨给国防科委作为新建的空间研究院院址（后为七机部五院、航天部五院）。学院的教职工在“文革”后期大部分陆续分配到外单位工作，留下的都由全国政协机关安排。中央社院就这样不复存在了。

恢复中央社院遇到的难题

1978年2月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召开，邓小平同志当选为全国政协主席，政协工作开始全面恢复。这次会上和会后，不少政协委员（主要是民主党派中的政协委员）要求恢复中央社院。当时，

原中央社院副院长聂真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秘书长，也认为应该恢复。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各项工作拨乱反正，要求恢复中央社院的呼声更高了，有些政协委员还联合提出提案。政协大会期间，聂真同志还召开过一些座谈会，参加会的委员异口同声要求恢复中央社院。

恢复中央社院，当时遇到的最大难题是校舍问题。只有把原校舍要回来，学院才能恢复。而校舍当时被七机部五院所用，一时迁出有困难。因此，虽然政协委员和各民主党派一再要求恢复，全国政协、中央统战部也给党中央、邓小平主席写书面报告希望尽快恢复，但终因校舍无法归还而搁浅。

当时，中央办公厅与主管国防科工委工作的张爱萍同志商量，如何才能及早恢复中央社院。张爱萍同志认为，七机部五院现在的办公用房，产权属社会主义学院，应当归还，但需另外给他们一个适合办公的地方。

不久，事有凑巧，中央决定撤销基建工程兵。而该兵种的司令部就在七机部五院即老社院公路的对面，近在咫尺。基建兵司令部院内有办公楼及各种附属设备，而积不小，足够七机部五院之用。经过各方面的努力，特别是当时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冯文彬同志的积极活动，终于在1982年2月26日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决定，将基建工程兵司令部的办公楼给七机部五院，而中央社院恢复原来的用房。随后，中央办公厅于1982年3月13日发出《中央会议决定事项通知》，要求“国务院办公厅、中直管理局、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同有关单位商量落实。”通知下达后，我们在全政协工作的同志都十分兴奋，奔走相告，政协委员和各民主党派的同志也极为高兴，几年的努力总算有了结果。大家都以为，中央社院的恢复已指日可待。

中央社院筹备组的建立

中央决定下达后，为具体落实中央社院的恢复工作，全国政协和中央统战部决定成立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筹备组，由全国政协和民主党派的有关人员组成，计6人，即孙晓村（当时为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民建中央副主席）、聂真（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李毅（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常委）、程浩（全国政协委员、副秘书长）、朱真（全国政协学会委员会委员、学委会办公室主任）、宁光堃（民革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孙晓村、聂真为正副组长，朱真负责实际工作。当时，我们都在原来的单位办公，只是一周左右开一次会商量工作。

全国政协的机关干部，有几位是原来在社院工作的。我们就请姜其玺（原社院办公室秘书）、朱作霖（原社院教师，当时在学委会办公室工作）一道来做些实际工作。大家一起挤时间，为社院的恢复尽绵薄之力。可以这样说，在中央社院的筹备期间，真正做具体工作的就是我们3个人。

“归还校舍”问题上的波折

为贯彻中央决定，归还社院校舍，中央办公厅、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负责人曾召集全国政协、七机部、社院筹备组的有关人员开会研究。当时，孙晓村、聂真、程浩和我都去过。开始时，我们认为很快就可以归还，谁知道“天有不测风云”，归还校舍一波三折，毫无进展。

回想当时召开的“归还校舍”问题会议，一般都是争执不下，不欢而散。全国政协和社院为一方，强调落实中央决定，强调非中共人士对恢复中央社院的强烈要求，强调统战工作的重要意义，强调七机部应当归还社院校舍（当时，我们曾给主管统战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习仲勋同志写报告，要求尽快落实中央决

定，仲勋同志明确批示：“谁借谁还”。而七机部为另一方，强调国防尖端科研的连续性、重要性、保密性，不宜搬迁，强调他们不是借用社院校舍，而是当时国务院拨给他们的，不存在“谁借谁还”的问题等等。总之，找各种理由，千言万语一句话，就是不肯搬。

本来，中央决定基建兵司令部住房交七机部五院。如果这样办了，七机部也就没有理由不归还社院校舍了。但是过了一段时间，由于种种不可预见的因素，基建兵司令部的房子拨给了别的单位，这一来“归还校舍”问题就更困难了。我们心急如焚，而七机部则“稳坐钓鱼船”。

说实在的，为“归还校舍”，我们真是想尽了办法。光是向中央和上级有关部门写报告就不知有多少次，那时几乎都是我起草（有时朱作霖同志也起草），隔不多久就写一次。除了按正常程序汇报、呼吁外，还设法通过多种渠道“疏通”。我曾给当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胡启立同志写过几次信，希望他帮助社院解决难题。胡是我解放前在北大学习时的老同学，解放后几十年从未联系过，这时也不得不求助于他。据了解，他把信批给有关部门解决。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依然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

基建兵司令部的住房不给七机部（这时已改为航天部）五院，五院不从社院校舍迁出，怎么办？出路何在？又经多次开会协商，直到1982年11月13日，中央办公厅召集有关各方开会商定：一、中央社院恢复，仍用原校舍。二、航天部五院用房向国务院提出报告另行解决。三、由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和航天部协商，为社院筹备组先腾出二三十间办公用房。会后，中办发了《会议纪要》。1982年11月24日，全国政协五届五次工作会议工作报告提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要在1983年正式开学，新华社向国内外发了消息。

这时，航天部又向中央写报告，建议社院另建，五院不搬迁为好。

1983年2月9日，国家经委根据国务院领导同志批示，召集

有关各方研究给谁新建问题。参加会的有几十人，国务院和北京市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也参加了会议。孙晓村、聂真、程浩和我都去了，会上又展开了热烈的争辩。最后，经委负责人提出四条解决意见：一、航天部五院新建。二、请中央拨款列入今年基建计划。三、地皮由北京市解决（航天部要求建在中关村，北京市当即表示只能在大兴或昌平选址新建）。四、航天部五院先退出部分房子供社院筹备、开学之用（对此条，航天部不同意）。这4条解决办法，我们是比较满意的。会后，经委将这4条报告了国务院领导人，得到同意。为执行这4条，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多次与航天部交涉，要求五院退一部分房子给社院，但毫无结果。

1983年3月，航天部向国务院写报告，说五院新建，时间会拖得很长（该部负责基建工作的同志私下对我说，最快也要10年以上），要求给社院新建。同年4月，航天部部长张钧向国管局答复，还是建议社院新建，社院房子不能退。至此，国管局也感到无能为力，召开会议也无意义。经了解，航天部五院根本不想离开老社院这块“宝地”，他们知道社院拖不起。

弄清了这些情况，我们进行了认真的研究，知道光讲道理、光着急、光生气是无济于事的。问题是1983年一定要办学，时间紧迫，这样争辩，无论如何也不能解决问题，受损害的还是我们自己。因此，必须从实际出发，找出一种办法，既有理，又切实可行，能为各方接受，解决实际问题。经反复考虑，我们感到要靠五院新建恐怕是不可能了，看样子社院新建较为可行。我们把想法向全国政协汇报，得到同意后，以全国政协机关党组名义起草了《关于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校舍问题的请示报告》（由我起草），于1983年5月6日报送中央、国务院。《报告》详细叙述了中央决定恢复社院一年三个月以来，为校舍归还问题进行协商的艰难过程。《报告》最后说：“总之，一年多来，社院校舍问题虽经中央决定，并得到有关方面的支持和协助，多次开会协商或决定，但由于航天部坚持不退还校

舍，故毫无进展，致使社院招生开学问题无法解决。对此，各民主党派及有关各方面反映强烈，意见很大。六届政协一次会议即将召开，去年五届政协五次会议已通过今年社院开学，现已刻不容缓，社院校舍若不迅速妥善解决，势将造成不良政治影响。”《报告》以建议形式，提出了解决社院校舍问题的两个方案供中央决策，第一方案是，“航天部退还社院原校舍，中央拨款给五院新建。”这个方案，我们知道是办不到的，但这是一年多来我们一直坚持的方案，也经一定会议商定过，因此，还是要重申这个方案。第二方案是，“如果中央认为航天部五院迁出有困难，需要社院另建，我们也坚决执行中央的新决定。总之是要最后决策，不能再拖。但由于恢复社院迫在眉睫，为了尽快建成新校舍，希望中央拨专款，列专项，列入今年基建计划，建筑标准照旧。”这第二方案是被迫提出来的，但实际上在当时是最佳方案。全国政协机关党组书记、秘书长彭友今在《报告》上署了名。

全国政协刘澜涛副主席5月11日批：“请杨静仁同志阅正后报中央。”为醒目起见，他对《报告》第二方案的全文都用粗铅笔加划，还在这段话的左侧加了两道加重号。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杨静仁随即批：“拟同意政协报告的第二项意见，请星垣同志批示。”国务院秘书长杜星垣于5月14日批：“请万里、依林同志审批，看来不给社会主义学院建房不行了。”万里副总理随即圈阅同意，姚依林副总理批示：“只能今年下半年做准备工作，明年开工。”

争议了一年多的校舍问题，终于有了结果，当《报告》的批文转下来后，我们才松了一口气，算在中央社院复校道路上走完了第一步，今后要为重建新校舍而努力了。

不了解内情的人们常常问，为什么中央社院不把原校址要回来？是的，我们何尝不想要。但一年多的波折，真可谓磨破嘴皮，写秃笔头，原校舍还是不可能回来。新建校舍才是唯一的出路。看完

上面的这段不算完整的回忆，我想读者也会得出这个结论的。

1992年10月，中央社院4万多平米的新校舍基本建成，举行了隆重的新校舍落成典礼。作为过来人，望着这新的现代化的建筑群，看着邓小平同志为新校舍题写的“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的金色校名，心中的确极为激动。回忆10年来的复校道路，真是“别有滋味在心头”。

新校址的选定

1983年5月14日，中央确定中央社院选址新建后，我们很快就草拟了中央社院校舍建筑方案（任务书），于5月28日报送国家计委审核。《方案》提出社院发展规模为在校学员800人，其中400人为全国和省、市、自治区政协委员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的中上层人士，400人为统战系统在职干部。还提出校址以西三环路两侧为宜，请北京市妥善解决。提出新校址占地150亩（10万平米），建筑面积58950平米，投资按当时物价估算为3000万元左右。《方案》上报后，我和有关同志到国家计委固定资产投资局与有关负责人商谈，经说清中央社院的性质、任务、特点等等后，他们不久就表示同意我们的方案，校址地点由我们和北京市商洽，基建规模分两步走，第一步先恢复到老社院时的建筑面积，不要超过4万平米（老社院占地5.6万平米，建筑面积3.6万平米），招收学员400人；第二步视以后发展和需要再定。第一期投资，经他们测算，确定为5000多万元。

计委这一关顺利通过了，有了基建指标、投资，那么校址选在哪里呢？北京市城区根本不可能，那就在三环路附近找。我们（主要是聂真、朱作霖、姜其玺和我）发现军事博物馆东边有大片破旧平房，是部队用来接待落实政策人员的临时住地，面积不大，约有100亩地左右。我们还看了其他一些地方，如现在西三环路计算机学院马路对面的大块农田等等，前后不下10处。

在北京市征地，都由市规划局统一审批、管理。我去找了市规划局局长周永源同志。他与我比较熟，在一起开展过城市经济学会的工作。周永源是规划局的老局长，政协委员。我和他一说社院要恢复，要重建，需选新校址等等，他热情地表示支持。他对老社院比较了解，也熟悉统战工作。他说，中央社院要重建，我们一定尽力选一块离城比较近的地方。他告诉我，北京市有规定，新建院校和大的单位，一律到大兴、昌平这些卫星城兴建，不能在城区和三环路内，因为都已规划完毕，各有其用，无法再容纳。他举例说，中国政法大学因校舍被外单位占用，要求选址新建，想在原政法大学附近征地，彭真同志也表示支持，但我们无法满足，只得让他们到昌平建新的政法大学校址。他还说，中央社院与别的院校不同，是统一战线最高学府，“党外的高级党校”，我们不能让去昌平、大兴，要尽量就近安排。我讲了我们看到的那几个地方，希望考虑选一处给我们。他说，那些地方早就有规划，已各有其主。他拿出了北京市的详细规划图给我看，指着图说这里干什么，那里是什么单位，一看就清清楚楚。的确，三环路内已无地可征，因为我们想要100来亩地，面积相当大。周永源同志让我放心，他们会帮助我们选一个合适的地点。

时间不长，经过再次联系，周永源同志说找到了。他说，中央民院西边有一大块菜田，是四季青公社法华寺大队的。这块地按规划是要建居民小区的，但考虑到中央社院的特殊情况，确定作为社院的新校址。这里环境较好，不嘈杂，东边是中央民院，南边不远有北京图书馆，再往南有紫竹院。这样的环境办中央社院是相当合适的，这里不再建居民小区，作为中央社院新校址，占地90亩（6万平方米）。选这里作新校址，还得到了当时海淀区区长时念畴同志（已去世）的大力支持。

我们筹备组的同志对北京市规划局的热情协助，都感到很高兴。真没想到，这个本来是很难解决的选地问题竟然这样顺利就

解决了。以后只要见到周永源同志，我总是向他表示感谢，他为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做了好事。他是北京市的老规划局局长，在为我们选定校址后不久就离休了，但他至今仍在为北京市的城市建设事业发挥余热，作出贡献。中央社院新校址的选定，他可以说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借中央社院复校十周年之机，我写下这些回忆，表示对他的一点敬意。

隆重的开学典礼

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工作，中央社院复校后的开学典礼就要举行了。1983年9月举行的全国政协常委会会议，正式任命孙晓村为中央社院院长，聂真、程浩为副院长，朱真为秘书长。

这是复校后的第一期统战干部培训班，是中央社院停止办学18年后的第一次办班，标志着社院的正式恢复，在国内外都有重要意义和影响。全国政协、中央统战部、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都对此十分重视，中共中央也深表关注。因此，以全国政协为主，决定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

开学典礼定在1983年11月7日。为示隆重，新任第六届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不顾年迈体弱，要来参加开学典礼，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的老一代领导人也表示要来参加。我们还特请中共中央领导人来参加，并代表中央讲话，给予指示。经中央办公厅联系，很快确定由中央分管统战工作的习仲勋同志参加、讲话。仲勋同志要我们草拟一份讲话稿，朱作霖和我承担了这一任务。开学典礼的日期日益临近，突然仲勋同志因故不能前来，他请当时的另一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宋任穷同志来参加。

开学典礼前两天，宋任穷同志的秘书来电话，说宋任穷同志看了讲话稿，想和起草人商量一下讲话内容。我立即去了，宋任穷同志询问了中央社院和这期学员的情况，我如实作了汇报。他对起草的讲话稿基本上表示满意，但说有个问题想在一起商量如何讲为

好。他提的是关于讲话稿中清除精神污染的那一段。起草时，我们根据1983年10月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关于“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的讲话精神，强调中央社院也要据此开展清除精神污染的工作。宋任穷同志说，贯彻小平同志讲话精神是对的，但中央社院是统战性质的学校，这期学员许多是民主党派成员，对他们不能按照我们对党员的要求去做，主要是学习、领会小平同志讲话精神，正面教育，不能在党外同志中开展这种斗争。我听了，感到他的意见是正确的，体现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我们起草的稿子有些片面性，不尽妥当。当时，宋任穷同志、他的秘书就和我一起商量如何修改，字斟句酌，直到大家认为满意为止。后来，他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就是按照修改稿讲的。这件事对我是个教育，从事统战工作一定要高瞻远瞩，一定要考虑统战的特点，在这条战线上，“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万万不可粗心大意”，更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另外，宋任穷同志作为党中央的领导人，为修改讲话稿而专门把我找去一道商讨，这种严肃认真又民主平等的工作作风是值得钦佩和学习的。

开学典礼在政协礼堂三楼举行。第一期干训班有学员74人，来自全国各地，主要是各级政协、民主党派、工商联的中青年干部，年龄以三四十岁的居多。大家十分兴奋地等待领导同志的到来。开会时间到了，我们陪着邓大姐、乌兰夫、宋任穷等领导同志步入会场，学员们起立热烈鼓掌，邓大姐频频招手，说：“同志们好！”开学典礼由孙晓村院长主持，聂真副院长简要报告中央社院复校筹办经过，然后请宋任穷同志代表中共中央讲话。

宋任穷同志一开始就说：“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在停止办学18年之后，今天重新开学了。它标志着中央社会主义学院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也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二大路线指引下开创统一战线工作新局面所取得的一个新成果。我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地祝贺！”他接着对中央社院的历史作了高度评价，说：“中央

社会主义学院，是党中央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充分协商之后，于1956年建立的。它一开始就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和关怀，‘社会主义学院’这个名字就是毛主席提出来的。这是一所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学校，是我国民主党派的高级党校，在国内外享有良好的声誉。”他在分析了我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的形势和任务后说：“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重新开学以后，应该适应我国爱国统一战线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要求，成为政协委员和民主党派、工商联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系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新时期党的路线、方针和基本政策的一个重要阵地。同时，社会主义学院也要成为培养、提高统战干部，特别是民主党派的年轻干部的学校，以适应‘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方针的需要。”他说：“我相信，在政协、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共同努力下，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一定能够完成历史赋予的新使命。”他在讲话的最后部分说：“这一期培训班的学员，都是比较年轻的同志，很有朝气，又是经过挑选来的，完全有条件成为巩固和发展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骨干力量。”表示了老一代革命家对年轻一代的关怀和鼓励。他向同学们提了三点希望：“一要充分发扬为振兴中华而刻苦学习的精神”；“二要坚持又红又专的方向”；“三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宋任穷同志的讲话指明了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在新时期的历史使命和任务，对社院的工作有长远的指导意义。这也是社院历史上第一次听到代表中共中央的正式讲话，因此激起了全场热烈的经久不息的掌声。

开学典礼上最激动人心的场面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学员合影留念。学员和社院工作人员（当时只有10人）站好后，我们陪邓大姐等领导人入场，这时学员们又一次热烈鼓掌。邓大姐在前排入座，第二排主要是女学员。邓大姐入座后，女学员们争先和大姐握手，大姐也满面笑容一一握手。利用照像前的一二分钟，大姐象慈母一般和女学员们亲切交谈，学员们沉浸在无比的欢乐之中。参加

开学典礼摄影的领导人,以邓大姐为中心,左侧为当时的国家副主席乌兰夫,右侧为宋任穷,依次为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军事学院院长肖克,六届全国政协现任副主席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主要领导人杨静仁、许德珩、胡厥文、严济慈、朱学范、周谷成、董其武、钱昌照、鲍尔汉、缪云台、费孝通、屈武,还有全国政协秘书长彭友今,我院正副院长。第二排中有当时全国政协副秘书长陆平、程思远、宋德敏,还有李毅和我,然后为女学员。这期学员 74 人,而参加开学典礼、合影的领导人有 20 多位,可见规格之高。最近,我又拿出这张珍贵的照片仔细端详,当时激动人心的情景又在眼前显现。非常遗憾的是,当时参加合影的我们敬爱的邓大姐和全国政协副主席以上领导人 16 人中的 8 位已经离开了人间。

隆重的开学典礼,成为学员们终生难忘的最值得纪念的一天。在回校的路上和回校后,他们兴奋异常,热烈谈论自己的感受和体会,有的连夜写信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自己的亲人。中央的关怀和嘱托,成为学员们努力学习的最强大动力。

~~~~~

## 迎 黎 春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自 1978 年创办以来,以其内容翔实、丰富而受到了国内外各方面读者的厚爱。现在,随着改革形势的不断深入发展,《天津文史资料选辑》如何办得更生动活泼,是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为此,我们以改革为动力,在领导的支持下,大胆地突破了十多年来一贯的编辑方式,从内容组合到版面安排,开始逐步向期刊化发展。当然,这只是一种小小的尝试,由于经验不足等原因,在很多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改进。但是无论怎么改,文史资料就是文史资料,它仍然会保持其独特的“三亲”史料特点,将高品味、有价值的文章奉献给读者,而决不会变成充斥街头巷尾、迎合低级趣味的庸俗读物。

借此,我们编辑部全体同仁,谨向多年来给予我们大力支持和厚爱的读者表示衷心地感谢,并希望今后能一如既往地支持我们、帮助我们,使《天津文史资料选辑》办得更好。